

冯沛祖 编

人怎样 拯救自己



人怎样 拯救自己

冯沛祖 编

人怎样拯救自己

冯沛祖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新华北路50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0册

ISBN 7-5360-2482-7

1·2139 定价: 11.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怎样拯救自己？

从埃及的“第一王朝”算起，人类有文字可考的确切历史已有五千余年了。在这段漫长岁月中，诞生过众多卓绝超群的伟人，发生过无数惊天动地的事件，难以胜计的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曾摆在人类的面前。国家出现了，民族诞生了，合而分，分而合，人类在奋斗与挣扎中发展到今天，历史上如何惊天动地的事件都一一最后平息下来了，人类面临过的一个个神话般的难题也在一个个获得解决，只是一代又一代的无数智者哲人探索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类，到20世纪似乎更叫人迷惑，那就是人类对自身的探求。

从1901年到今天，人类在科学上所获得的成果，几乎等于1900年以前的总和，可见20世纪是物质科学空前进步的时代。但是，也正是在这个20世纪，人类却发生了空前的惨剧：爆发了两次伤亡最为惨重的世界大战，成功地制造了具有无比杀伤力的核武器——而它们却又正是科学进步的产物。正因为科学的进步，人类反而给自身蒙上了一重阴影，把自己笼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

剧气氛之中。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的勃兴，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时代”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鼓吹，均曾给予世界以鼓舞人心的光明。但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人类理想”，因着空前残酷的战争与战后的全球性动荡，在西方文明世界中崩溃了。

20世纪对全人类来说既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晦暗的时代。人类至今似乎仍未能找到自身的“安宁之道”，而面临的危机其深刻性更甚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因为它是从内而发的——是精神与心灵方面的。

人怎样拯救自己？

这个为人类一直所不断地探求的老问题，在20世纪似乎尤其突出。

“什么是人？一半是畜生，一半是天使。”这是恩格斯引用别人的话。纵观历史，从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这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适用于各个国家与民族，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一半对一半”。任何伟人，要想为全人类开出一张十全十美的药方来功德圆满地解决“拯救人类”的问题，看来是永无可能的；但人们可以从某些卓有成就的哲人对人生的信念中得到某些“拯救”的启迪——哪怕是从反面——则是可能的。本书之所以奉献给读者，其目的也不外如此。

这里辑录了21位在20世纪公认卓有成就的西方哲人谈论人生、命运、社会、宗教、世界政治及人类前途诸方面问题的文章。哲人，指的是在某一领域其才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这些著名人物包括哲学家、科学家、文学

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史学家、医师兼神学家及企业家和飞行家。他们来自英、美、法、德、荷等不同的国度，大多数人亲眼目睹过两次世界大战，各自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危机——世界性的、国家民族的以及个人内心的。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娓娓道出各自的人生信念、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对人的看法、人应该怎样生活、人怎样拯救自己。

这是一批卓有成就的哲人，他们的信念各有所别，甚至大相径庭，但自有其深刻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和凡人一样，也有自己欠缺的地方。本书所选的文章不求一致，只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出虽均有成就，但对人生却各有不同看法的哲人的不同信念。唯书是不对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怎样拯救自己？这本身就已蕴含着一种“上下求索”的精神，而对此问题的探求将是与人类自身相始终的。

基于对人类前程的共同关注，力求使世界得到拯救，人类趋于和谐，心灵世界以及外在世界的真、善、美均得到发展，人需要的不是对任何哲人信念的直接追随与仿效，需要的是从这些信念中获得启迪，并坚持那不懈的求索精神。

冯沛祖

1988年5月

目 录

爱因斯坦.....	1
J.赫胥黎.....	10
罗素.....	22
杜威.....	37
胡克.....	54
萨特.....	67
加缪.....	74
施本格勒.....	86
弗洛伊德.....	107
弗洛姆.....	112
埃利斯.....	127
毛姆.....	142
福斯特.....	169
托马斯·曼.....	183
奥登.....	191
路德维希.....	208
房龙.....	222
瑟伯.....	242
希尔顿.....	250
林白.....	260
施韦策.....	265

爱恩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公认的最具创造性才智的人物之一，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巨人。生于德国乌尔姆镇。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观念。1916年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其理论对科学和哲学都作出了革命性的探索，被誉为是开本世纪科学新纪元的第一人，在人类对宇宙认识的贡献上可说是无与匹敌的。

爱因斯坦虽为科学家，却博览过众多哲学家的作品。他有一句名言：“上帝是难以捉摸的，但他决无恶意。”他以哲学家探索神秘的精神来探寻科学宇宙的奥秘。他为人谦虚，不狂傲，善良而纯真，这是很多名人所做不到的。他富有正义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德赴美。1939年，他得知德国人发现核裂变有可能研制核武器，随后致函罗斯福提请注

意，促使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他的确立了质量和能量的相当性的公式 $E=mc^2$ 成了研制原子弹的理论基础，这其实有违他那善良的天性。他心中充满了高度人文的信仰，并无所谓“人文”与“科学”之争，因为两者都供给了他生命的情趣。

下文选自《20世纪智慧人物的信念》，林衡哲译。

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只是来此做短暂的旅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不过有时候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确有某种目的存在。

但是尽管如此，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看，至少有一点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才活在这个地球上，特别是为了那些给我们微笑与幸福而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人；此外也是为那些无数不认识的只是透过对彼此命运的同情而产生一体之感的同类活着。有时候在一天之内，我会屡次想起我自己外在与内在的生活，有绝大部分是靠着别人努力的成果。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死去了，有些还活着，因此，我也热烈地希望我能尽力地回报别人曾经给我的恩惠。结果，我那平静的心灵时常会被一种忧郁的感觉——我从别人完成的工作那里借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弄得惶惶不安。

因此，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我不相信我们人类能够获得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的行动不仅受制于外界的压力，同时也受内在需要的支配。叔本华说：“一个人确实可以做到他想要去做的事，但是他却无法决定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这句话在我年轻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后每当我目击或忍受生命的痛苦时，我总是想起这句话，从而获得了不少安慰。这个信念便是我日后容忍力的源泉，因为它启示我们别把自己或别人的事看得太严重，对一切事应该怀有宽大的观点，我甚至觉得这句话有助于幽默感的养成。

从客观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思索人为什么要存在的理由以及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是极端愚笨而无聊的事情；然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某些理想来引导其愿望与思想前进。经常在指引我向前迈进并且使我的日常生活充满生之喜悦的理想便是善、美和真。以追求舒服与快乐为目标的生活从未吸引过我；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伦理体系，虽能充分地满足家畜，但却无法满足人类的心灵。

要是没有与志同道合的人去共同追求艺术与科学的未知领域这种美的感觉存在，我将会觉得我过去的生命是空虚的。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轻藐那些陈腐的教条与习俗对人类抱负所作的种种限制。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占有、外表的成功、出风头、奢侈的生活都是无聊的东西，我深信一种纯朴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这不仅是对身体而言，对心灵亦然。

我对社会正义与社会责任所怀抱的热忱与兴趣，刚好和我缺乏与他人直接接触的欲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是一匹只有单一马具的马，不适合参加群体的行列。我从未全心全意地觉得我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或属于我那一圈子的好朋友，或者甚至未曾属于我的家庭。我与他们之间的连系总是渗合着一种模糊的超然与冷淡，而这种退隐到自我天地的欲望却与年俱增。

这种孤立的情形有时候是相当使人痛苦的，但是我并不后悔这种与他人的了解和同情绝缘的状态，因为虽然我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也获得了补偿。我可以做独立的思考，而不会受习俗、舆论以及他人的偏见的影 响，而且也从未把我平静的心灵放在这些变动的基础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一个人都必须被尊重，但是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偶像化。也许是命运的讽刺，我过去却获得了那么多我不想得到也不该得到的崇拜和尊敬，也许这种奉承是来自我把大家都想了解的少数观念向前推展，从而满足了大家未获满足的希望。

当然，我也知道为了要达到某种确定的目标，不得不有一个人来担任思考、领导和负责大部分的责任，但是那些被领导的人不应该任意被人摆布，同时他们必须拥有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者的权利。我似乎觉得区别各种社会阶级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到头来还是要靠武力解决。我深信，每一个暴力的独裁专政，最后一定免不了会带来一段衰落的黑暗时期，因为暴力总是会不可避

免地吸引那些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历史已经证明，每一个有名的暴君最后总是为一批恶棍所继承。

为此之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存在于今日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政权。现在欧洲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未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并不在于民主的理论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政治领导阶层的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下的非个人化特质。我相信，在这方面，美国是发现了正确的途径，因为他们有一位经过充分的长时期选出来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去执行他的实际责任；另一方面，我以为德国的政治系统是使人类成为病态的更扩大的准备。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在人类生活的壮观行列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政体，而是有创造力、有感受性的个体与人格。当一般群众的思想陷于呆滞，感情陷于麻木时，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却能创造出崇高与卓绝的东西。

我们所能经验到的最美丽的东西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艺术与科学的源泉。任何人对于不知的事物，不感到徘徊，不感到惊异，那么他的心虽生犹死，他的眼睛虽明如瞎。这种对生命神秘的经验，虽然多少会渗合着恐惧，但却是产生宗教的原因。要了解某些我们无法透视的事物的存在知识，了解它所呈现出来的最高的智慧和最灿烂的美，以我们可怜的理解力，我们只能了解其最原始的形式，而这种奥秘的知识与感情构成了真正宗教的重心；惟有从这方面，我才是属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

但是，我不能想像有一位会奖惩他的造物的上帝，如果真有这样的上帝的话，那么，他跟我们凡人无异了；我也无法想像有我们所能经验的有意志的神。换言之，这样的上帝不过是人类脆弱意志的反映而已。我也不相信人在躯体死亡之后仍依然活着的说法，只有那些怀着惧怕与可笑的自我主义的脆弱心灵的人，才会有这种看法。我对于在有生之年能思索生命永恒的神秘，感到很满意。我只要对这个存在的宇宙，神奇的构造能够惊鸿一瞥地觉察到，并且使自己致力于了解其中的一部分，使理性能够显现于此自然中，即使是多么渺小的一部分，我也是非常满足了。

追 记

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当我重读此文时，我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产生出来，其一是我所写的东西本质上还是与过去一样的真，但另一方面却令人有陌生与遥远的奇怪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世界有巨大的变动，还是只不过是自己的年纪变大了，而以不同的眼光在观察同一件事物？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年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那些决定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应该是不变的吧？会不会是我那批评的理性是如许的易受影响，以致这些年来我身体内的生理变化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很明白我对人生一般问题的看法，这些年来在情绪方面并无多大改变，而

我自己的外在环境也无法找到改变的理由，因为我知道它在我的思想与情感的决定上，总是居于次要的地位。

不，是有一些十分不同的东西牵涉在里边。这些年来大家对人类社会稳定的信心正大量减少，整个人类生存的根基都开始在发生动摇，这不仅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一种威胁，而且是一种低级的价值系统在取代所有过去人类奋力以求的高级价值系统。

一个拥有自觉力的人，他一定会经常敏锐地意识到：生命是一种冒险的历程，生命必须永远与死亡搏斗。一部分的危险来自外部，例如一个人可能会从楼梯上掉下来而摔断了颈部的骨头，或虽然无罪却被判刑，或为毁谤所中伤等等。在人类社会，生存不啻是意味着必须冒各式各样的危险，不过这些危险在本质上都是属于偶发的紊乱，而且与运气有关；但就整体而言，人类社会依然是稳定的，它依然是以审美与道德的理想来做衡量的标准。总之，这一切一切都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虽然有时免不了有各式各样的意外灾祸，但大体而言生存是安全的。人们对此事的肯定犹如人之呼吸一样的自然，甚至美德与抱负的标准和平实的智慧都被视为不可侵犯的遗产，而为所有文明社会所共守。

无疑地，世界大战的降临已经动摇了整个人类的这种安全感，生命的神圣义务消失了，一个人再也无法随心所欲地做他所喜欢的事，到他所喜欢的地方去。谎言被当作尊严的政治工具，但是大家都把战争视作外在的事件，事实上它也是人类意识中有计划行动的结果。战

争中断了人类正常的外在生活，全球的人类都公认它是不幸与罪恶的产物，不过还好的是大家对人类的理想与价值的安全感依然没有动摇。

其次发生的另一件政治大事，它对社会心理背景的影响似乎没前者那么大。起初有短暂的妥协的进展，这是威尔逊^①首先倡导而成立的国际联盟所带来的，这一来使国与国间建立了集体安全的制度，然后又有法西斯国度的崛起，打破一连串的国际公约并且对人类及弱小国度公然采用暴力，顿时集体安全的制度崩溃了。这一次崩溃所发生的影响，至今仍无法估计，这是表示有关国家的领袖，缺乏坚强的个性与责任感，同时也与那些民主国家为了避免任何有力的攻击，所作出的短视的自私决策有关。

最后世局的演变，比极端的悲观主义所预言的还要糟。在欧洲，生活于莱茵河以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思考再也不存在了，那些掠夺权柄的歹徒正在威胁群众的安宁，青年人也正被系统的谎言所毒害，那些政治冒险家的“假成功”使世界上其他的人感到困惑。在世界各地普遍地认为，这一代人缺乏上一代那种为了争取人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而甘愿容忍痛苦的折磨与伟大的牺牲的力量与精神。

① 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提出“建立国际联盟保障和平”的主张。

——编者注，下同。

十年以前，这些事情从未跑进我的脑海里，但在今日，几乎在我存在的每个时刻，都游荡着这一道阴影，这点是我在重阅过去的文章时所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

然而，我知道人类虽有改变但也不会改变得太多。虽然不同时代所流行的不同观念使人产生形形色色的不同状貌，虽然像现在这种时代潮流带给他想像不到的悲哀，但是最后所留下来的将不过是在历史的书籍上增加了几页可怜的篇幅，向年轻的下一代简短地描叙他们的祖先的愚昧形象。

J·赫胥黎

(Julian Huxley, 1887—1975)

他来自一个世界性的显赫家族——英国赫胥黎家族。他的祖父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T.H.赫胥黎；他的父亲是著名传记作家L.赫胥黎。此家族祖孙三代人中出现了很多杰出人物，在生物学、人类学、工程学、物理学、文学、商业、艺术、外交、教育、国际事务等方面均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J.赫胥黎本人是生物学家、唯理论者、科学哲学家、科学人文主义者，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美国康斯顿的莱斯学院、剑桥的国王学院及皇家研究院。曾任第14版《大英百科全书》生物部门的编辑和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首任总干事。其弟A.赫胥黎是当代赫赫有名的文学家与神秘主义者。两人不仅能在科学领域做专门的研究工作，而且还能够把研究的成果与智慧，用优美的文笔写成大众化的作